

闽商史研究

第一辑

● 主 编 何志毅 王贤斌

● 执行主编 方宝璋

中國工商出版社

新华都商学院闽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闽商史研究

第一辑

主 编：何志毅 王贤斌

执行主编：方宝璋

中国工商出版社

责任编辑 袁 泉 杨爱军
封面设计 人文在线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闽商史研究 / 何志毅, 王贤斌主编. —北京: 中国工商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80215-560-2

I. ①闽… II. ①何… ②王… III. ①商业史—研究—福建省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7049 号

书 名/闽商史研究 (第一辑)
编 著/何志毅 王贤斌

出版·发行/中国工商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5.5 字数/610 千字

版本/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花乡育芳园东里 23 号 (100070)

电话/ (010) 63730074, 83670785 电子邮箱/zggscbs@163.com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书号: ISBN 978-7-80215-560-2/F·791

定价: 75.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名 誉 主 编：陈发树 杨 斌

主 编：何志毅 王贤斌

执 行 主 编：方宝璋

执行副主编：黄永锋 吕庆华 刘文波

目 录

唐末五代福建商业贸易的发展与闽商的崛起	戴显群 / 1
论宋代福建海商之崛起	刘文波 / 8
略论宋代福建商业	方宝璋 / 31
南宋建宁书坊业研究述略	章 广 / 52
宋代兴化城镇集市商业与戏剧繁荣	方 晴 / 69
神缘与商缘的互动	吴鸿丽 / 77
论宋元时期福建造船业与海商	陈 娟 吴 杰 / 82
从月港到十字门：明代漳州海商严启盛史事补论	张 侃 / 93
明朝后期的海商与台湾	陈名实 / 131
论明朝时期闽商的发展及其特点	周福振 / 141
东方民族国家与民间商业团体的互动	罗青林 / 150
顺风相送到琉日：明清时期福州海事活动与海外移民 (1368—1840 年)	陈怡行 / 160
明清时期闽台商贸中的“番银”研究	徐心希 / 205
论漳州海商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周榜师 陈 曦 漆珮娜 / 226
略述闽人在册封琉球过程中的贸易特点	孙清玲 / 256

明清时期闽西客商浅述	郭小燕 刘 晶 / 263
近代社会转型期的泉州绅商	陈桂炳 / 280
试论近代侨批业与国营邮政的关系嬗变 (1896—1937 年) ...	焦建华 / 290
闽商郭有品与天一信局诚信经营	黄清海 / 309
澳门闽商史论纲: 1949—2010 年	水海刚 周永胜 / 321
新时期闽商群体与澳门的中华文化遗产	张青林 / 339
当代闽商社团组织研究	贾广宁 / 351
商品进口与近代厦门社会变迁	李 颖 / 363
近日来华西方人视野中的福建小商人形象 [英] 麦嘉湖 (John Macgowan) 著	王尊旺 / 372
现代泉商生成条件的理论阐释	许旭红 / 384
泉州市创意产业现状调查	吕庆华 林楹荷 任 磊 / 396
福建上杭铜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人力资源现状分析及对策 ...	黄顺春 王倩妮 / 416
从城运会历史看八城会对福州城市未来发展的影响	郑志强 / 433
场馆创新型融资模式对福州海峡奥体中心建设的启示	陈华敏 / 446
以闽商海洋文化 促游艇经济发展	鲍 韵 / 458
略论闽商精神	李国田 / 467
略论闽商文化的特点	朱灵通 / 473
赣商与闽商发展的差异比较研究	戴庆锋 / 482
客家传统与客家商人	赵 剑 / 497
略论闽台商业习俗	于洪涛 / 506
闽商与妈祖信仰	李 颖 / 515
华侨华人对福建对外开放的重大影响和贡献	王盛泽 罗雄飞 / 528
双杭商业文化保护与开发论纲	王 宏 / 537
闽商研究现状述评	郑淑蓉 王小锋 吕庆华 / 543
编后记	方宝璋 / 559

唐末五代福建商业贸易的发展与闽商的崛起

戴显群^①

摘 要：闽商作为一个地方的商帮，早在唐末五代时期就开始形成，它比形成于宋代的徽商还要早。应该说，是唐末五代福建商业贸易的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造就了闽商。从此以后，闽商作为一个颇有地域特色和具有一定名气的商帮，一直活跃于海内外市场，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作出重大的贡献。

关键词：唐末五代；商业贸易；闽商

一、唐末五代福建城乡商业的发展

闽人自古就有善贾习俗，唐人独孤及称“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货广利，与巴蜀埒富，犹无诸、余善之遗俗”^[1]。隋唐以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福建的商业也逐渐得到发展。

在商业发展过程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城市市场。唐代的城市市场，就是指州府县治的“市”。唐代的市专设于州府县治以上的城市，唐朝政府规定“诸非州县之治，不得置市”^[2]。市有种种制度，唐代市制基本上保留了秦汉

^① 作者简介：戴显群，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来的传统：

其一，市由官设。其二，市必须设在固定的地点，成为一个特定的商业区域。

其三，交易时间有严格限制，唐代的城市模式一般为城坊制度，市设在坊中，坊有墙有门，定时启闭，市也不能例外。

至于唐代福建州县市场状况，地方文献上缺乏记载，因此得不出较完整的概念，只能根据零星材料略见一二：

福州地处闽江下游，又有通海之便，是全闽最主要的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所谓“东闽盛府，百货所聚”。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 806—820 年）又修成了福州西门至延平富沙的官道，促进了福州与内地的商业往来。唐末以前，福州城只有子城一重，最初是西晋晋安（西晋时福州称“晋安郡”）太守严高所筑，唐中和年间（公元 881—885 年），观察使郑镒拓其东南隅^[3]。子城只限于官署和官吏士卒所住，而集市和民居还是在城外。唐末天复年间（公元 901—904 年），节度使王审知于子城外筑城 40 里为罗城^[4]，罗城建立以后，城里的街坊和里巷也逐渐完整，福州城才初具唐代城坊制度格局。后梁开平二年（公元 908 年），王审知又在罗城的南北端修筑南月城和北月城，将罗城夹在里面，这就是所谓“夹城”^[5]。夹城范围，其南端由安泰桥边的罗城“利涉门”扩展到现南门兜的“宁越门”，其北端由钱塘巷的罗城“永安门”扩展到越王山麓的“严胜门”、“遗爱门”一带^[6]。王氏不断扩大城池的目的是为“守地养民”，所谓“守地”，就是为巩固其封建割据局面，防御邻藩入侵；所谓“养民”，就是为了适应城市经济和商业发展的需要^[7]。唐代福州的市先是设在子城外，唐末以后，城池扩大，市在城内街坊中，但市的形式、名称和具体地点，于文献无征，仅知安泰桥一带“人烟繚错，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箫管从柳阴榕叶中出”^[8]。可见当时安泰桥一带是商贾云集之处，也是引客作花柳之游地区，亦可窥见唐五代福州商业繁华之一斑。

泉州是以海上贸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港口商业城市，是唐代我国四大贸易港之一。唐代泉州城也只有子城一重，唐欧阳詹曾于贞元九年（公元 793 年）作《泉州北楼记》^[9]。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晋江令赵颐正凿沟通舟楫于城下^[10]。所谓“市井十洲人”中的市场和民居均在子城外。闽国末年，留从效据泉州时，在子城外筑罗城周 23 里 283 步^[11]，“泉城市，旧狭窄，

至是扩为仁风、通淮等数门，教民间，开通衢，构云屋……岁丰，听买卖，平市价，陶器、铜铁，泛于番国，收金贝而还，民甚称便”^[12]。

建州是福建与内地、中原交通的必经之路，也是福建最早的经济开发地区。古代中原人民避乱入闽，都先在这里安家落户，唐末五代离乱，“江北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13]。因此唐代建州的商业发展仅次于福州、泉州。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刺史陆长源改筑建安县城为州治，周9里343步；唐末天祐年间（公元904—907年），刺史孟威添筑南罗城；五代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闽王延政增筑周20里^[14]，适应了城市经济和商业发展的需要。

而州府县治城市以外的农村市场，是以定期集市为主，这种集市在岭南、福建等地称为墟（墟）。随着农村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一些定期的墟市，逐渐发展而建立起固定的店肆，因而升为场，政府设有场监，从事税收工作。唐代福建从大历四年至咸通五年（公元769—864年），计95年中就有九场三镇的设立。九场者，上杭、武平、梅溪、感德、归德、大同、桃源、小溪、武德；三镇者，永贞、黄连、归化。

唐代福建场镇规模和商业状况，如唐大中十三年盛均《桃林场碑记》所云：

今已卯年，覲季父于此，视廛里若巨邑，览风物如大邦，鳞鳞然廛宇之罗，霭霭然烟火之邦……是以俗阜家泰、官清吏闲。凌晨而舟车竞来，度日而笙歌不散^[15]。

五代十国时期，唐代的一些场镇更发展成各地区的商业和交通中心，如唐代的小溪场。此时已是“居民鳞次雍雍然以和，官廛翼如济济而有办，由陆而至者，必出其涂，自水而运者，会流于下，坐肆列邸，贸通有无”^[16]。小溪场最终于后周显德二年（南唐保大十三年，公元955年），升为安溪县。还有如唐代的永贞、黄连、归化三镇，以及梅溪、感德、归德、大同、桃林、武德六场，也都相继在这一时期升为罗源、建宁、泰宁、闽清、宁德、德化、同安、永春、长泰九县^[17]。

二、唐末五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

隋唐以来,福建海外贸易兴起,与岭南、扬州地区同为阿拉伯、波斯以及南海商人从海路来华经商贸易地区。

唐中叶,泉州作为一个对外贸易港口而迅速崛起。唐天宝、大历间人包何^[18],曾有《送李使君赴泉州诗》一首:“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19]可知当时泉州是异国商人云集,且南海诸国使臣从泉州上岸朝贡唐廷非常频繁。唐政府还在泉州设“参军事四人掌出使导赞”^[20],专门负责接待外国使臣事务。

公元9世纪中叶,泉州已发展成唐代四大贸易港之一。当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柯达贝(Ibn Khorda beh)著有《道程及郡国志》一书^[21],书中有关于唐代中国四大贸易港的记载。

这四个贸易港的译名指的何地?历来中外学者作了大量考证,基本上已成定说^[22]。它们分别是交州(今河内)、广府(广州)、泉府(泉州)、江都(扬州)。

海上交通贸易活动,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唐代伊斯兰教、婆罗门教和摩尼教都已在泉州进行传教活动。

唐代四大贸易港中的交州、广州和扬州,于唐末均不同程度遭受战乱破坏或衰败或停滞。唯福建社会相对安定,外国商人遂逐渐把来华贸易视线移到福建。而王审知治闽期间,很重视发展海外交通贸易事业。为了鼓励商业贸易,发展经济而创造了种种便利条件,同时为了“招徕海中蛮夷商贾”而开辟了甘棠港。由于客观条件和王审知的政策得当,闽中的商业贸易一时十分繁荣。

王审知在福州所设置的榷货务,是专门处理外商贸易事务的机构,授随从王氏入闽的光州固始人张睦三品官,领榷货务。在张睦任职期间,“佐审知甚忠,能与抢掠之际,雍容下士,招蛮夷商贾,敛不加暴,国用日以富饶”^[23]。在海外贸易过程中,除了“招蛮夷商贾”外,自福建发船到海外经商贸者亦不少,当时有发自福州,也有发至泉州等地。王审知侄儿王延彬继其父王审邦为泉州刺史至十七年之久,“海发蛮舶,无失坠者,人称招宝

侍郎”^[24]。由于官方鼓励商人出海贸易，从而出现了五代后期福建（尤其是闽南地区）的海舶和商人出海贸易的一时盛况。五代闽莆田人黄滔，有一首《贾客》诗云：“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凿上咱，何如少经过。”^[25]诗中就是描述了包括闽商在内商贾在大海上随波逐利的情形。

三、“闽商”的形成和崛起

唐末五代时期，海外贸易活动给福建带来大量的异国珍品，闽国政府从海外贸易中，增加大量的财政收入，所谓“国用日以富饶”。同时，大量的异国珍品，如象牙、犀角、香药、珍珠、玳瑁、龙脑、沈香、胡椒、肉豆蔻、饼香、煎香、蔷薇水等也都输入福建。这些舶来品还通过闽籍商人又输入中原地区，很受青睐，商人们也因此殷富，拥有一定的势力。这一时期，一个具有浓厚福建地域特点的商帮开始形成和崛起，它就是闽商。早在宋代文献《清异录》中，就开始出现“闽商”这一名称，并记载了他们在闽国时期的一系列商业活动。

闽商赖此海外奇货珍品活跃于国内市场，常有为争夸豪雄，与外地商人发生“争邸”之类的商务纠纷^[26]。而且，在海外商业贸易过程中，闽商的势力和影响也日益扩大，那种贬抑商人的传统制度和观念也开始发生了动摇。闽商凭借着雄厚的实力，参与和介入闽国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闽国统治者常有借助闽商之力，保持与五代中原王朝的往来，甚至以闽商作为闽国的使者而“奉表称藩”于五代王朝^[27]。闽商人林仁翰，林灵仙曾孙，后事闽王延曦，曾谋求市舶司之官^[28]。后晋开运元年（闽永隆六年，公元944年）二月，闽拱宸都指挥使朱文进等杀王延曦，自称闽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长五十余人皆杀之。当年十二月，已官“南廊承旨”的林仁翰，率众杀朱文进、连重遇等，迎建州富沙王兵入城^[29]。

总之，闽商作为一个地方的商帮，早在唐末五代时期就开始形成，它比形成于宋代的徽商还要早。应该说，是唐末五代福建商业贸易的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造就了闽商。从此以后，闽商作为一个颇有地域特色和具有一定名气的商帮，一直活跃于海内外市场，为福建经济的发展，以及海

内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重大的贡献。

注 释：

- [1] (清) 冯登府撰《闽中金石志》卷1《成公李椅去思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 [2] (宋) 王溥撰《唐会要》卷8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 [3] (清) 孙尔准、陈用光等修《重纂福建通志》卷17《城池》，同治七年正谊书院刻本。
- [4] (清) 孙尔准、陈用光等修《重纂福建通志》卷17《城池》，同治七年正谊书院刻本。
- [5] (清) 孙尔准、陈用光等修《重纂福建通志》卷17《城池》，同治七年正谊书院刻本。
- [6] 参见1979年福州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编《福州地方志》上第4章《城市的形成和变迁》。
- [7] 参见1979年福州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编《福州地方志》上第4章《城市的形成和变迁》。
- [8] (清) 孙尔准、陈用光等修《重纂福建通志》卷29《津梁》，同治七年正谊书院刻本。
- [9] (唐) 欧阳詹撰《欧阳行周文集》卷5，四部丛刊缩印本。
- [10] (清) 孙尔准、陈用光等修《重纂福建通志》卷17《城池》，同治七年正谊书院刻本。
- [11] (清) 孙尔准、陈用光等修《重纂福建通志》卷17《城池》，同治七年正谊书院刻本。
- [12] 晋江西街《留氏家谱》卷3《宋太师鄂国公传》。
- [13] (明) 黄仲昭纂《八闽通志》卷3《地理风俗》，明弘治间刊本。
- [14] (清) 孙尔准、陈用光等修《重纂福建通志》卷17《城池》，同治七年正谊书院刻本。
- [15] (清) 冯登府撰《闽中金石志》卷1《桃林场碑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 [16] (清) 冯登府撰《闽中金石志》卷5《初建安溪县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 [17] (清) 孙尔准、陈用光等修：《重纂福建通志》卷2、3《沿革》，同治七年正谊书院刻本。
- [18] 包何，唐天宝年间登第，大历间任起居舍人。
- [19] (清) 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08，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 [20] (明) 陈懋仁撰《泉南杂志》卷上, 程晋芳家藏本。
- [21] 该书原为阿拉伯文, 公元 1865 年西方学者 Barbier de Meynard 首先译成法文于 Journal Asiatique (大亚细亚杂志) 中, 书名曰: le Tivre des route et des prosh (汉名曰《道程及郡国志》)。历来所引用者, 皆以此法译本为主。
- [22] 详见桑原骝藏《唐宋贸易港研究》。其中关于 Djanfou 的地名, 最初西洋学者曾有过建昌说、杭州说和扬州说等, 桑原骝藏从地方物产、地理位置、地形、译音以及文献记载等方面有力论证了为泉府 (泉州)。此后, 韩振华先生又提出福州说 (《福建文化》第三卷第一期《伊本柯达贝氏所记唐代第三贸易港之 Djanfou》)。
- [23] (清) 谢道承、刘敬与纂《福建通志》卷 3《名宦传·张睦传》, 乾隆二年刊本。
- [24] (清) 吴任臣撰《十国春秋》卷 94《王审邽传》、《王延彬传》,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年版。
- [25] (清) 李调元撰《全五代诗》卷 84,《丛书集成》本。
- [26] (宋) 陶谷撰《清异录》卷上,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3 年版。
- [27] (清) 谢道承、刘敬与纂《福建通志》卷 2《通纪》, 乾隆二年刊本。
- [28] 见蔡永兼《西山杂记》“东石之舟”条。
- [29] 详见《资治通鉴》卷 284“开运元年”条。南廊承旨, 注云: “闽所置官, 盖亦侍卫武臣之职也。”

论宋代福建海商之崛起

刘文波^①

摘要：宋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发展十分活跃的时代。居于东南沿海的福建，作为两宋时期重要的经济区域和海外贸易的重镇，福建海商在宋代海外贸易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日显突出，逐渐崛起为国内沿海商人的代表。本文结合宋代福建社会经济环境、地理交通条件、社会习俗影响三方面因素，来探讨福建海商相较于其他区域的海商而言，更有条件在宋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有着特殊的表现。

关键词：宋代；福建海商；海外贸易；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繁荣的时代。海外贸易的空前活跃是其时代特征之一，被誉为“与元代并处于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历史曲线的最高段”^[1]，更为海外学者视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2]。居于东南沿海的福建，作为海洋中国的巨镇，在宋代海外贸易版图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宋人苏辙即言“长乐大藩，七闽之冠；衣冠之盛，甲于东南。工商之饶，利尽南海”^[3]。而“闽中民稠地狭”，沿海居民“贵贱惟滨海为岛夷之贩”^[4]，苏轼更言“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5]。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先生认为：宋代以来，称为闽商、闽贾、闽船的福建商人们的活动，开始为社会所注目^[6]。

^① 作者简介：刘文波，泉州师范学院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



福建海商在宋代的崛起,是有其时代背景,并对当时福建、乃至全国的海外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学术界于此有专论者有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宋代福建商人的活动及其社会经济背景》^[7],但大多论者的涉及是从不同角度加以阐述,其中有台湾学者李东华《九世纪——十五世纪初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8]、香港学者苏基朗《中国经济史的空间与制度:宋元闽南个案的启示》^[9]、郑学檬先生《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10]、胡沧泽先生《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兴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11]、葛金芳先生《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12]、黄纯艳先生《宋代海外贸易》^[13]。此外,尚有众多论著所及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介绍。这些论著对于本论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启示。

日本学者桑原鹭藏先生曾认为:自公元8世纪开始,到15世纪欧人来航东洋,这八百年间为阿拉伯人在世界通商贸易舞台上最活跃的时代^[14]。然而,唐中叶以来,中国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的开发、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介入海外贸易,影响也随之扩大。唐末五代以来,中国对外海上交通兴起,李东华先生认为:在黄巢之乱以前,掌握中外海上贸易者多为阿拉伯人,黄巢入广州杀蕃商十二万人,后来外商视为畏途,国人遂起而代之^[15]。延之宋代,伴随着海外贸易的空前繁荣,中国民间海商的活动极其活跃,福建路作为两宋时期重要的经济区域和海外贸易的重镇,福建海商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自然不能被忽略。

其实,两宋时期,福建境内“住蕃”的外商为数不少,“胡贾航海踵至,富者货累巨万,列居城南”^[16]，“三佛齐之海贾,以富豪宅生于泉者,其人以十数”^[17],在泉州形成“蕃人巷”。影响较大的有“居泉之城南,自是船舶多至其国矣”的南毗国罗巴智力干父子^[18];有“乔寓泉南,轻财乐施,作丛冢于泉州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的阿拉伯人施那帗^[19];有“自就蕃船一只”,“贩乳香直三十万”投泉州而被宋廷授予“承信郎”的蒲罗辛^[20]。更有世代长期“住蕃”而“华化”的蕃商,其中最以蒲氏闻名,“泉之诸蒲,为贩舶作三十年,岁一千万而五其息”^[21]。尤以蒲寿庚最具影响,其“擅蕃舶利三十年”,成为宋元交替之际的一代风云人物。这些居于福建境内的蕃商及其后裔为两宋时期发展同海外的交通贸易联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不应忽略的事实是,宋代福建海商在交通海外诸国的贸易联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及活跃程度与之相比也毫不逊色。

元祐之前，福建未有市舶机构之设置，当时“泉人贾海外者，往复必使诣广东，否则没其货。海道回远，窃还家者过半，岁抵罪者众”^[22]。给福建与海外联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有关这一时期福建海商与海外诸国贸易联系之记载仍屡见于史籍。及至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福建市舶置于泉州始，福建与海外贸易联系乃空前发展。从蔡襄到赵汝适，历任泉州的地方官员在其著作中都留下了福建与海外联系的一笔，从“通互市于海外者，其国以十数”^[23]，到“暇日阅诸蕃图”、“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达五十八处^[24]，这些国家不仅涵盖高丽、日本、南洋诸国，还远及阿拉伯、东非，即可说明福建与海外诸国联系之日渐频繁。与此同时，福建海商的活动也日趋活跃。

阅诸史籍，当时在南洋各主要国家中即可历寻福建海商的足迹。在閩婆，北宋初年，即淳化年间就有“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数往来本国，因假其乡导来朝贡”^[25]；在三佛齐，《夷坚志》即有“泉州僧本称之兄为海贾赴三佛齐”^[26]，至南宋初年，“泉州纲首朱纺舟至三佛齐国……往返不期年，获利百倍”^[27]；邻近中国的占城、交趾，联系则更为密切，如庆历三年，有“杀巡检使，寇掠数十州境，亡入占城”之“温、台府巡检军士鄂陵”，泉州商人邵保，“以私财募人之占城，取鄂陵等七人而归，泉首广市，乞旌赏”^[28]。而交趾“其国土人极少，半是省民”，连“其祖（李）公蕴亦本闽人”，故对“闽人附海舶往者必厚遇之，同使之官，咨以决事”^[29]，以致“所任乃多闽人”^[30]，此亦引起宋朝统治者的注意，宋神宗曾有诏令言及“福建、广南人因商贾至交趾，或闻有留彼用事者”^[31]。

而福建海商联系最为密切者则数日本、高丽等国，尤以高丽为首。据《宋史》载：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32]。苏轼在《论高丽进奏状》中亦言：“自二圣嗣位，高丽数年不至，淮、浙、京东吏民有息肩之喜，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其间凶险之人，犹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戡（泉州商）者甚众。”^[33]根据文献记载，日本学者斯波义信^[34]、台湾学者李东华^[35]、大陆学者陈高华^[36]或列表、或详举资料，统计其中商人之籍贯，有籍可考者竟以福建一路居多。故李东华先生更认为可以“泉州商人掌握宋丽（高丽）贸易之事”来说明泉州对外交通之盛^[37]。

福建海商在穿梭于海外诸国、奔波于远洋贸易之时，与国内沿海、沿江

乃至内陆地区的贸易联系也是十分活跃。当时，南至海南，是“闽商越贾，舶交其中，”^[38]北及山东，亦“皆闽艘吴舰与渡而渔，且漕者之所出入”^[39]。其中不乏由此致富不赀者，《淮海集》载有：林昭庆“泉州晋江人也，少趺驰，以气自任，尝与乡里数人相结为贾，自闽粤航海道，直抵山东，往来海中者数十年，资用甚饶”^[40]。更有闽商转向内陆，如“化州以典质为业者，十户而闽人居其九，闽人奋空拳，过岭者往往致富”^[41]。因此，两宋时期，福建海商不仅在国内与“吴商越贾”齐名，更被时人视为可与当时来宋外商“海贾”相提并论的国内沿海商人代表，欧阳修在描述杭州商业之繁华时，即言“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42]。

上述可见，福建海商在两宋时期已崛起为国内沿海商人的代表，在国内地区间贸易、与海外诸国远洋贩易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地位，这已为宋人所认可，也为现代学者的不断深入研究所确证。然而，我们要真正地认识福建海商之所以能在此历史阶段有如此的表现，仅仅靠上述资料，描述其与各地、各国的贸易联系过程，而能完整再现福建海商的崛起历程，总会给人留下意犹未尽之感觉。正如《透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整合研究》所言：“东南的特殊环境与历史条件不仅促使该地区海商的孕育，而且规定了该地区海商的发展道路。”^[43]因此，本文拟结合福建当时社会经济环境、地理交通条件、社会习俗影响，冀以深入了解福建海商这一特殊群体在两宋时期的突出表现之缘由。

一、社会经济环境

福建僻处东南一隅，原为蛮荒荒远之地，延至宋代，却为时人所惊叹：“昔瓯粤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44]其实，早在唐代，福建地区渐次开发。隋时，福建境内仅置闽州，辖县4：闽县、建安、南安、龙溪^[45]。唐初则由闽州逐步分出建州（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漳州（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武荣州（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景云二年改称泉州）及汀州（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共辖23县^[46]。唐中叶以来，中原动荡，北人南来，福建地区的社会经济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从大历四年（公元769年）至咸通五年（公元864年），福建地区就增设了9场3镇，即指大